

博物馆纳粹大屠杀主题国际展览中的跨文化记忆转化

Cross-Cultural Transformation of Memory in Museums' International Holocaust Exhibitions

江明圆

Jiang Mingyuan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上海, 200433)

(Departm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Museolog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内容提要: 博物馆不仅是文化记忆的存储媒介, 更是记忆共享与转化的重要载体。21世纪以来, 以纳粹大屠杀为主题的博物馆国际展览在记忆的跨文化转化上表现突出。此类展览通过选择与展出地存在时空关联的选题, 促进文化他者到自我记忆的转化; 以伦理和道德的视角揭示人性之善恶, 将存储记忆转换为功能记忆; 运用个人叙事方式构建理性表述、激发情感共鸣, 助推集体记忆向个人记忆转变。国际经验表明, 实现文化记忆在主体、客体与方法上的三重转化, 博物馆展览更能深入人心、产生影响。

关键词: 博物馆 国际展览 跨文化 文化记忆 纳粹大屠杀

Abstract: In addition to serving as a repository for cultural memory, museums play a crucial role in the dissemin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memory. Since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international Holocaust exhibitions have excelled at cross-cultural memory transformation. By selecting themes with a spatial and temporal connection to the holding sites, these exhibitions facilitate the reconfiguration of the cultural otherness to self-memory; by revealing the goodness and evil of human nature from an ethical and moral perspective, they reshape storage memory into functional memory; and by employing personal narratives to construct rational representations and stimulate emotional resonance, they facilitate the convers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into personal memory.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demonstrates that museum exhibitions are more likely to reach people's hearts and have an impact when cultural memory is triple transformed in terms of subject, object, and method.

Key Words: Museums;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cross-culture; cultural memory; Holocaust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约600万犹太人遭希特勒法西斯迫害和屠杀, 史称“纳粹大屠杀 (Holocaust)”^[1]。自20世纪70年代起, 以反思这一事件为内容的“记

忆潮”席卷全世界^[2], 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 二战纪念与纳粹大屠杀混合在一起, 大屠杀不再指代某一特定历史事件而开始发挥记忆的隐喻功能^[3]。

近年来,以纳粹大屠杀为主题的博物馆展览不断走向世界。纳粹大屠杀不仅是海外博物馆国际展览的一大主题,也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文化记忆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借助这些研究成果,我们能提炼出展览在记忆共享与转化上的成功之处,为中国博物馆相近主题展览的策划与实施提供一定参考和借鉴。基于此,本文将在简析文化记忆理论及其与博物馆、国际展览之间关系的基础上,通过对纳粹大屠杀主题国际展览的案例研究,剖析展览转化文化记忆的路径与特点。

一、文化记忆、博物馆与国际展览

“文化记忆(cultural memory)”概念于1988年由德国历史学家扬·阿斯曼(Jan Assmann)提出,指“关于一个社会的全部知识(全部文字材料、图片和礼仪仪式等)的总概念,在特定的互动框架之内,这些知识驾驭着人们的行为和体验,并需要人们一代一代反复了解和熟练掌握它们”^[4],其关键在于理解回忆、认同和文化的延续三者之间如何发生关联^[5]¹⁶。其中,研究者尤其重视记忆的传承,即回忆如何以文化的形式在共时和历时语境中不断共享并绵延^[6]。文化记忆研究存在着主体、客体和方法三个维度的问题域^[7],记忆的转化也主要在这三个维度实现。

文化记忆的主体为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的群体。扬·阿斯曼从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的集体记忆理论出发,认为文化记忆具有群体关联性的特点^[5]³²⁻³³,能促进自我认识的塑造,建立文化认同。然而,这种回忆共同体强调与外部的差异性,不同群体的文化记忆不同^[8]⁶,彼此之间存在地域、民族、语言等差异障碍。文化记忆若要跨文化、地域和尺度产生影响,需要将其转变为与群体自身文化关联的记忆,在架构“他者”的过程中从外部视角审视并构建“自我”^[9]。

文化记忆的客体着眼于分析文化记忆的内容。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将文化记忆的客体分为有人栖居的功能记忆和无人栖居的存储记忆

两种互补模式^[10]¹⁴⁶⁻¹⁵⁶:存储记忆指向与当下相关性弱、不具有生产力的记忆;功能记忆记录的是与现实联系的、不断进行经验积累的记忆。功能记忆和存储记忆在面对身份构建时可以相互转换^[11],文化记忆的传承伴随着调动存储记忆并将其重构为功能记忆的过程。

文化记忆的方法涉及认知和媒介两个层面^[12]。在认知层面,人们需要通过回溯个人记忆(个人生活史)和认知记忆(过去遇过、经历或者听说过的事情)来识别新的知识^[13]。因而,文化记忆的传承过程需要从集体聚焦到个人,将文化记忆转化为可识别的、与个人相关的记忆。在媒介层面,文化记忆无法不言自明,需要依赖一定的媒介(如符号、意象和仪式)来表现^[10]¹¹。而博物馆被视为“记忆之场”^[8]²³,是文化记忆的重要媒介之一。

综上所述,文化记忆的共享依赖于其主体、客体和方法的同步转化。在此视角下,博物馆不仅可以作为记忆存储媒介,更能成为推动文化记忆转化的实体。博物馆通过展教活动重构和再现记忆,能实现文化记忆的多重转化。这是当代博物馆的新使命,也是博物馆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14]。

其中,博物馆国际展览是助力记忆跨文化流转的重要载体之一。作为“移动接触地带(mobile contact zone)”^[15],国际展览往往具有跨文化交流属性^[16]。因而,国际展览中的记忆共享突出表现为在不同文化之间的转化:一场好的进展展览能助推本地观众记忆“内部全球化”过程^[17],把展览中他国的关注重点变成地方性本土经验的一部分;而一场成功的出境展览能有效地将本土记忆变换为他者可理解并认同的文化记忆。纳粹大屠杀主题展览走向世界的过程正是跨文化记忆转化与共享的过程。

二、纳粹大屠杀主题国际展览中的跨文化记忆转化

纳粹大屠杀主题国际展览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彼时,波兰奥斯威辛-比克瑙国家博物馆(Państwowe Muzeum Auschwitz-Birkenau)

在捷克、匈牙利、比利时等国家举办展览^[18]，但辐射面局限于欧洲。这一主题的国际展览真正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则要归因于2005年联合国决议通过的《大屠杀和联合国外联方案》（*The Holocaust and the United Nations Outreach Programme*）。该方案决定在每年1月27日，即缅怀大屠杀受难者国际纪念日前后组织举办有关大屠杀的临时展览^[19]。通过对这些展览的文本、研究文献和相关报道的梳理，结合文化记忆理论展开分析，可以从记忆主体、客体和方法三个维度归纳出这些展览的特点。

1. 时空关联选题与记忆主体转化

对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铭记大屠杀有着不同的功能和目的^[20]。纳粹大屠杀在博物馆展览中的叙事也由各自的社区与所在国家塑造^[21]。因而，各博物馆对大屠杀的呈现存在诸多差异。寻求与当地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的时空结合点，对内容进行调整，实现从文化他者到自我的转化，纳粹大屠杀主题国际展览才能真正实现记忆的跨文化共享。

国际展览通过主动建构屠杀发生地与展出地之间的空间联系，能够有效促进跨文化交流，并最终贡献于记忆的转译与识读。2016年，以色列亚德瓦希姆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 Memorial）赴澳大利亚悉尼犹太博物馆（Sydney Jewish Museum）举办“我是我兄弟的守护者：致敬国际义人（*I Am My Brother's Keeper: Honouring the 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展览。由于聚焦38个移居澳大利亚的幸存者家庭，展览成功地将远在欧陆的大屠杀事件转化为幸存者如何受到国际义人帮助前往澳洲生活的故事^[22]。该思路契合澳大利亚文化记忆中对于开放、自由和包容理念的认同^[23]。这不仅得到幸存者家庭的认可，悉尼犹太博物馆馆长格斯·莱勒（Gus Lehrer）也曾表示，展览还能够激励博物馆每年约2.5万名年轻观众^[24]。此外，悉尼犹太博物馆在此过程中也结合馆藏对展览内容进行调整，为该展览添加了套头衫、茶具等展品，使展览更贴近澳洲观众。

而在时间维度上，展览与当下关联、形成类比^[25]，能够给观众以实际、切身的体验。反之，展览就

会成为自说自话、阻隔现实的“屏障记忆（screen memory）”^[26]，妨碍记忆的进一步转化与跨文化理解。这就要求国际展览不仅要真实呈现大屠杀历史，更要围绕展出地的热点事件和关注议题进行内容拓展，保持与当代社会的相关性^[27]。荷兰安妮之家博物馆（Anne Frank House）的“安妮·弗兰克：历史的见证（*Anne Frank: A History for Today*）”国际巡展在此方面表现突出。该展览在内容文本上虽不根据每一站进行调整，但会结合展出地所在社区面临的社会问题开展教育活动。展览在尼加拉瓜展出时，针对当地受种族紧张局势、极端主义思潮和高度暴力影响的“高危”年轻人群，举办工作坊，邀请他们担任展览导览员^[28]，帮助这些被社会边缘化的年轻人树立自尊、培养生活技能；当该展览移步摩洛哥展出时，则以宽容和多元化为主题，通过师生研讨会的形式来引导中东冲突下的穆斯林年轻人反思摩洛哥历史如何影响当今社会的各方面，启发个人思考塑造自我、影响未来的可能性^[29]；展览巡至新西兰时，则重点关注当地社区普遍存在的种族歧视和霸凌问题，举办角色扮演活动、设置讨论卡片^[30]，让观众反思生活中的人权问题。以大屠杀记忆为起点，展览及其教育活动将视野纵深至当下的社会，并根据实情灵活调整。这种多方位、动态的记忆延伸被美国学者迈克尔·罗斯伯格（Michael Rothberg）称为“多向记忆（multidirectional memory）”，不仅能够阐明其他苦难的历史与现状，同时也扩展了正义的概念和含义^[31]。

需要指出的是，文化记忆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的在地化转换并不矛盾，二者共同助推记忆转化。其最终目的在于实现“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32][123]}，即他者记忆的本土重塑。围绕展出地的观众主体，有针对性地策划展览、实施教育活动，文化他者的记忆才不会停留在缺乏本地体验、无法认知的纯粹过去，展览才能对观众理解当下、思考未来产生积极影响。

2. 伦理道德视角与记忆客体转化

从记忆客体角度来看，对于非亲历者而言，

作为历史事件的纳粹大屠杀是与现实无关的存储记忆。通过将其内涵提炼升华到人性的高度，并以此启发观众思考，才能将存储记忆转变为功能记忆，进而延续文化记忆。以色列学者阿维夏伊·玛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对此提出：诉诸道德和伦理两个层面，才能共享记忆^[33]⁶⁵。纳粹大屠杀主题国际展览在视角选择上往往侧重于对人性的批判反思和对人道精神的宣扬，正对应着记忆客体转化的两条路径。

记忆的道德共同体是一种消极的记忆。玛格利特认为，出于守卫道德的必需，奴役、驱逐市民和大规模灭绝等对道德的攻击行为应当被保存并牢记^[33]⁷⁰，这也成为纳粹大屠杀主题国际展览广泛采用的视角之一。2008—2009年法国大屠杀纪念馆（Mémorial de la Shoah）策划并在美国犹太遗产博物馆（Museum of Jewish Heritage）展出的“在乌克兰枪杀犹太人：枪林弹雨的大屠杀（*The Shooting of Jews in Ukraine: Holocaust by Bullets*）”，由波兰奥斯威辛-比克瑙国家博物馆策划，2017年至今在西班牙、美国和瑞典巡展的“奥斯维辛：不久前，不远之处（*Auschwitz. Not Long Ago. Not Far Away.*）”从屠杀地的前后对比、纳粹建筑的建造、暴行实施过程等多角度控诉大屠杀反映的人性中绝对的恶，用意在于警示观众让此类事件“不再发生（never again）”^[34]。在此基础上，博物馆还可以进一步深挖主题，以批判性视角来审视大屠杀事件。由美国纳粹大屠杀纪念馆（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策划，2019年至今在德国多地巡回展出的“有些是邻居：选择、人类行为和大屠杀（*Some Were Neighbours: Choice, Human Behaviour, and the Holocaust*）”展览打破了传统意义上施暴者和受害者的二元对立。通过圈划指出纳粹大屠杀相关历史照片中位于角落旁观或路过的民众，展览引导观众反思：“邻居如何成为告密者、帮凶和凶手？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保持沉默，却只有少数人提供帮助？”^[35]正如展览最后一块展板中所言“人们是有选择的”^[36]，该展览意在表达面对大屠杀时旁观者的冷漠和趋利避害，而展厅中的观众也正“旁

观”着展览中的内容。将观众与大屠杀中的“邻居”置于相似情景中，展览能激发观众反思历史与人性的弱点。

不同于展示人性之恶所形成的道德共同体，记忆的伦理共同体指向对人的关爱和忠诚，是一种积极的记忆^[33]⁶⁵。在纳粹大屠杀主题国际展览中，这一类展览往往讲述个人、群体及社会组织在大屠杀期间的救助行为，彰显人道主义精神。1963年，以色列亚德瓦希姆大屠杀纪念馆成立由以色列最高法院大法官领导的公共委员会，授予“国际义人（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称号，以表彰那些在大屠杀期间冒着生命危险拯救犹太人的非犹太人^[37]。这些逆流而上的施救者所展现出的勇气、正直与力量，正是记忆伦理共同体建设的极佳载体，在博物馆国际展览中也经常看到国际义人的故事。其中既有成功救助被害者的积极实践，如2006年波兰加利西亚犹太博物馆（Żydowskie Muzeum Galicja）与以色列亚德瓦希姆大屠杀纪念馆合作举办的“波兰英雄：那些拯救犹太人民的人（*Polscy Bohaterowie: Ci, którzy ratowali Żydów*）”中帮助犹太人藏身家中、隐匿雅利安和逃离贫民窟的六千多名波兰普通民众；也有试图大声疾呼、但最终无力改变结局的案例。波兰犹太人历史博物馆（Muzeum Historii Żydów Polskich）2013—2018年赴美国、以色列、加拿大等国展出的“世界知道——杨·卡爾斯基的人道使命（*The World Knew: Jan Karski's Mission for Humanity*）”展示了波兰流亡政府的信使杨·卡爾斯基向盟军领导人通报纳粹德国对犹太人实施灭绝的行径。虽然他的控告没有引起重视，大屠杀最终仍然发生；但展览向观众传达：面对极端事件，人们有勇气、毅力和使命捍卫并守护人类的价值观和伦理。这样一种积极正面的、建构性的策展视角，是文化记忆的“热回忆”方法^[38]，引发观众反思自我行为，学习榜样并汲取前行的动力，形成对当下和未来具有启示的功能记忆。

3. 个人叙事方式与记忆方法转化

相较于“历史”这一概念指向的冰冷思想活动

及其理性分析方法和批判性话语,文化记忆研究者认为,正是由于“记忆”根植于每个人心中,文化记忆是生动而鲜活的^{[8]3-32}。大屠杀事件见证人、受害者、幸存者的口述资料和信件、日记等文字信息真实而有力,带有类比和隐喻性质^[39]。在国际展览中运用个人叙事方式,能天然拉近观众与那些原本难以理解的人、事或话题之间的距离,更有利于文化记忆的形塑。事实上,这已经成为纳粹大屠杀主题国际展览的常用策略,其目的在于从理性的历史表述和感性的情感共鸣两方面激发观众。

个人故事切入点虽小,但见微知著,能反映特定群体经历,进而折射出大屠杀的历史脉络。缺乏相关情境的国际观众对于大屠杀的记忆往往停留在被害者“死亡”或“逃难”的宏观而模糊的印象上^{[40]108}。国际展览从个人故事入手、还原个体经历,通过大量细节为观众营造在场感,能够为大屠杀历史增加真实性和可信度。以色列亚德瓦希姆大屠杀纪念馆2011年至今在美国、中国香港、意大利等多地展出的“生命点滴:在大屠杀中做一名女性(*Spots of Life: To Be a Woman in the Holocaust*)”选取九位犹太女性的故事,分别置于爱情、母亲、关爱他人等九个主题之下,以手稿、照片和物件讲述她们的人生故事。九个故事与九大主题反映了女性在面对大屠杀时的坚韧与力量。这既是她们个人的经历,也是大屠杀中女性生命点滴的缩影。而以黑色加粗字体标注的每一位女性的最终结局,都醒目地向观众揭示大屠杀的残酷。通过丰富的细节和强烈的对比,展览让观众突破单纯的观赏性限制,作为“见证者”参与其中^{[40]11}。这一“个人—群体—历史”的叙事逻辑链在2011—2016年亮相以色列、美国和澳大利亚的“超越传统:德语学术文化中的犹太数学家(*Transcending Tradition: Jewish Mathematicians in German-Speaking Academic Culture*)”等一系列国际展览中都有所运用。它们定位大屠杀相关的特定身份人群,聚焦于个人故事,为大屠杀的历史叙事提供细腻而真实的细节。

与此同时,个人叙事还能唤起观众的认知反应,产生移情,引发共鸣。由甘玛腊奥基金会

(Gamaraal Foundation)和苏黎世瑞士联邦理工大学当代史档案馆(Archiv für Zeitgeschichte, ETH Zürich)联合主办,2019年曾在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展出的“最后的大屠杀幸存者:在瑞士”巡展将这一作用发挥到了极致。展览没有设置部分和单元,仅展出了大幅的黑白肖像照、幸存者的证词和讲述录影。在展厅中“直面”幸存者的观众虽然并未历经大屠杀,但幸存者伤痛记忆所蕴含的失落与悲伤能够与观众的自我记忆相连接,形成与自身经历的共鸣,将陌生的大屠杀集体记忆转化为个人记忆,激发观众的同理心^[41]。在第一人称的叙述中,过去与现在的界限被模糊,观众从“旁观者”变为“亲历者”,从内心重新体验历史事件。而前文提及的“安妮·弗兰克:历史的见证”国际巡展、法国大屠杀纪念馆赴美国展出的“海伦·贝尔:被盗的生命”(Hélène Berr, a Stolen Life)等关注遇难者个体的展览则给观众以更痛心的情感冲击。观众在展览伊始便已知晓受害者最终遇难的结局,但随着展览展开,日记、照片和其他相关者的证词不断丰富着人物形象,观众在与故事主人公建立层层联系的同时也目睹着人物一步步走入死亡的深渊。这种“移情的不安”虽然给人以不适和无力感^[42],但个人叙事所蕴含的强大情感力量能给观众以深刻的印象,也更容易形成持久的文化记忆,甚至能改变观众的认知与行为。

三、总结与启示

纳粹大屠杀主题国际展览经验表明,推动记忆从文化他者到自我、存储记忆到功能记忆、集体记忆到个人记忆三重维度上的转化,能促进观众的理解和认同。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以巨大民族牺牲支撑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43]。我国博物馆国际展览对于抗日战争与日军暴行的呈现与纳粹大屠杀主题国际展览有一定相似之处,都需要实现文化记忆的转换。从这个角度来看,纳粹大屠杀主题国际展览的经验非常值得我们借鉴。

与此同时,本文虽聚焦于记忆的跨文化转化,但战争与博物馆当代观众的时空隔阂和记忆转化不仅是国际展览需要考量的问题,一定程度上也能启发此类博物馆的一般展览以及内容相近的灾难主题展览的策划。进而言之,博物馆在展示不同主体、不同内容的记忆时是否也具有运用文化记忆理论的可能?这值得进一步探究。

总之,国内对博物馆运用文化记忆的研究尚

处于起步阶段,博物馆展览究竟如何实现记忆的共享和转化、如何提质增效依旧是一个重要议题。当然,从主体、客体和方法入手只是文化记忆理论中的一种分析框架,跨文化的共享只是文化记忆转化的一种向度。本文基于纳粹大屠杀主题国际展览的研究是分析该问题的初步尝试,抛砖引玉,期待更多的实践经验总结以及更系统科学的研究。

参考文献

- [1] 潘光. 试论纳粹大屠杀及其对犹太民族和文明的影响[J]. 世界历史, 2000(2): 12-22.
- [2] 马萍. 全球化、抗战博物(纪念)馆与民族国家——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下抗战记忆空间的构建[J]. 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 2020(4): 120.
- [3] 赵静蓉. 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 173-174.
- [4] 哈拉尔德·韦尔策. 社会记忆(代序)[M]//哈拉尔德·韦尔策. 社会记忆: 历史、回忆、传承. 季斌, 王立君, 白锡堃,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4-6.
- [5] 扬·阿斯曼. 文化记忆: 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 金寿福, 黄晓晨,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 [6] 刘慧梅, 姚源源. 书写、场域与认同: 我国近二十年文化记忆研究综述[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 48(4): 185-203.
- [7] 余宏. 源流与分类: 当代西方文化记忆研究的基本架构[J].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 36(6): 25-30.
- [8] 皮埃尔·诺拉. 记忆与历史之间: 场所问题[M]//皮埃尔·诺拉. 记忆之场: 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 黄艳红, 等,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 [9] JOY A. Beyond the Odyssey: interpretations of ethnographic writing in consumer behaviour[M]//PEARCE S M. Interpreting Objects and Collections. London: Routledge, 1994: 305.
- [10] 阿莱达·阿斯曼. 回忆空间: 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M]. 潘璐,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 [11] 阿斯特莉特·埃尔, 安·瑞格妮, 徐雪英, 等. 文化记忆及其动力学[J].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0(2): 20-25.
- [12] 阿斯特莉特·埃尔. 文化记忆研究导论[M]//阿斯特莉特·埃尔, 安斯加尔·纽宁. 文化记忆研究指南. 李恭忠, 李霞,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6-7.
- [13] 保罗·康纳顿. 社会如何记忆[M]. 纳日碧力戈,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19-27.
- [14] 严建强. 缪斯之声: 博物馆展览理论探索[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0: 4-13.
- [15] DAVIDSON L, CASTELLANOS L P. Cosmopolitan ambassadors: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cultural diplomacy and the polycentral museum[M]. Delaware and Malaga: Vernon Press, 2019: 18.
- [16] 孔达. 跨文化视角下的博物馆国际展览类型与评估[J]. 东南文化, 2020(6): 169-177.
- [17] ASSMANN A, CONRAD S. Introduction[M]//Memory in a global age: discourses, practices and trajectories. London &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8.
- [18] Auschwitz-Birkenau State Museum. 1960-1969[EB/OL]. [2021-05-16]. <http://auschwitz.org/en/museum/history-of-the-memorial/memorial-timeline/years-1960-1969>.
- [19] United Nations. Outreach Programme on the Holocaust[EB/OL]. [2021-04-18]. <https://www.un.org/en/holocaustremembrance>.
- [20] MACDONALD S. Memorylands: heritage and identity in Europe today[M]. London: Routledge, 2013: 188-213.
- [21] YOUNG J E. The texture of memory: Holocaust memorials and meaning[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1-17.
- [22] DESIATNIK S. Honouring the righteous who saved our families[N/OL]. The Australian Jewish News, 2016-12-08[2021-04-20]. <https://www.australianjewishnews.com/honouring-righteous-saved-families/>.

- [23] KENNEDY R, GRAEFENSTEIN S. From the transnational to the intimate: multidirectional memory, the Holocaust and colonial violence in Australia and beyond[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2019(32): 403–422.
- [24] Sydney Jewish Museum. Launch: I Am My Brother's Keeper, Honouring the 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EB/OL]. (2017–01–17) [2021–11–0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fEwBj18V1U>.
- [25] ASSMANN A. The Holocaust— a global memory? Extensions and limits of a new memory community[M]//CONARD S, ASSMANN A. *Memory in a global age: discourses, practices and trajectories*. London &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97–117.
- [26] LEVI N. “No Sensible Comparison”? The place of the Holocaust in Australia's history wars[J]. *History & Memory*, 2007, 19(1): 124–156.
- [27] 郑奕. 相关性 共鸣度 同理心——博物馆企及观众的关键所在[J]. *东南文化*, 2018(1): 116–121.
- [28] CHYRIKINS M, VIEYRA M. Making the past relevant to future generations. The work of the Anne Frank House in Latin America[J].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2010, 21(1): S7–S15.
- [29] POLAK K. Tolerance education in Morocco. ‘Anne Frank: A History for Today’: learning about our past—contributing to our future[J].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2010, 21(1): S51–S59.
- [30] TUNSTALL J. Taku Manawa/My Human Rights, a case study in partnership: Waikato Museum working with the human rights commission[J]. *Curator: The Museum Journal*, 2012, 55(3): 287–299.
- [31] ROTHBERG M. *Multidirectional memory: remembering the Holocaust in the age of decolonization*[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3–5.
- [32] MACDONALD S. *Difficult heritage: negotiating the Nazi past in Nuremberg and beyond*[M]. London: Routledge, 2008: 123.
- [33] 阿维夏伊·玛格利特. 记忆的伦理[M]. 贺海仁, 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
- [34] LEVY D, SZNAIDER N. Memory unbound: the Holocaust and the formation of cosmopolitan memory[J].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2002, 5(1): 87–106.
- [35] Deutscher Bundestag. Einige waren Nachbarn: Täterschaft, Mitläufertum und Widerstand während des Holocaust[EB/OL]. [2021–04–19]. https://www.bundestag.de/besuche/ausstellungen/parl_hist/einige-waren-nachbarn-580636.
- [36]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Some were neighbors poster set[EB/OL]. [2021–04–19]. <https://www.ushmm.org/teach/poster-sets/some-were-neighbors>.
- [37] Yad Vashem. Names and numbers of 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EB/OL]. (2021–01–01)[2022–09–03]. <https://www.yadvashem.org/righteous/statistics.html>.
- [38] 金寿福. 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J]. *外国语文*, 2017, 33(2): 36–40.
- [39] POWERS–JONES A H J. Ripples in the pebble pool: dark narrative as maxim, metaphor and memorial[M]//KIDD J, CAIRNS S, DRAGO A, et al. *Challenging history in the museum: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Farnham & Burlington: Ashgate, 2014: 47–57.
- [40] HANSEN–GLUCKLICH J. *Holocaust memory reframed: museums and the challenges of representation*[M].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14.
- [41] 马萍, 潘守永. 论博物馆语境下的创伤记忆表征美学——“真实在场感”的内涵及展示策略[J]. *中国博物馆*, 2017(1): 7–13.
- [42] LACAPRA D. Trauma, absence, loss[J]. *Critical Inquiry*, 1999, 25(4): 696–727.
- [43] 习近平.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665.